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广场 作为政治符号的确立

——以上海人民广场为例

钟 靖

内容提要 上海人民广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空间符号化的代表，在空间收回、赋名和物质空间再造中已经确立了政治符号的意向。经由庆典集会、展览活动、文娱表演、体育活动等仪式活动的经典化，人民广场进而建构成满足政治宣传与教化，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政治需求的重要社会空间。双重化空间的契合与互构使得人民广场政治符号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并呈现出凝固的直观感与流动的渗透感双重特质。最终，人民广场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的表征完全被镌刻入人民的价值判断体系中。

关键词 人民广场 政治符号 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 政治仪式

中国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国家入侵，殖民主义者在一些城市建设了富有近代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新中国成立伊始，这些充满殖民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被人民政府接管后，纷纷被重新命名，并被给予新的功用。这其中不少就被赋予了“人民广场”的称谓。

“人民”一词冠于广场之前，绝非仅指涉独立个体，而成为了涵盖面较广的系统性政治象征符号。“人民广场”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完全确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它包含具体物质空间的生产——即广场再造——创造出符合人民政府需求的新空间。但广场物质空间生产必须追溯至原有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的改变，即对之前空间的收回与命名。除此之外，还得仰仗基于人民广场物质空间开展的各种政治仪式——集会、展览、娱乐、体育等活动，构建出不可回避的广场社会空间。人民广场的空间生产可谓是一个人民政府创造符合新中国发展需要的双重化空间过程。

鉴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整体的政治背景，各地人民广场作为政治符号的确立呈现许多共性，本文选取上海人民广场这一典型代表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间，原来蜚声海内外的远东第一跑马厅如何转变成为新中国的政治符号，国家权力如何在上海人民广场渗透与彰显，如何将人民广场这一政治符号牢牢镌刻进人民的观念意识之中。

一、上海人民广场的收回、命名与再造

坐拥五百亩场地，雄踞上海市中心的跑马厅作为殖民色彩浓厚的公共空间，从一个主要是殖民者、上层人士或有钱有闲阶层光顾的空间，转化为一个主要供人民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的政治化人民广场和人民乐园（跑马厅北部被改造成人民公园），其功能角色演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经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才最终功成。政治权力的更迭最终促成了这一空间角色的重大转变。人民政府掌握跑马厅空间生产的控制权后，根据政权及当时形势的需要，重新认定其性质，并重建与重组了具体空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将空间假定为一个客观的、中性的对象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它并非一个剥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科学对象，它一直保持着政治性和战略性，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产物^①。可见，即使是具体物质空间的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包含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运作。人民广场物质空间生产的最终完成有赖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这一建构从国家权力主导跑马厅的收回运动伊始，已然拉开序幕。

（一）上海人民广场收回、命名

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开始着手接管上海租界，跑马厅成为聚焦点。一时间有关跑马厅改建和收回方式等各种议题喧嚣而起。时任市长吴国桢曾提议恢复赛马，以充盈市府，为将来购回跑马厅预作准备^②。提案一出全市哗然，从“江湖”到“庙堂”立即对此展开热烈评议，最终“反对赛马”的压倒性意见让这一提案无疾而终^③。之后，商讨的收回方式包括通过外交途径，征用跑马厅并按市价补偿，或通过郊区土地交换^④。由于政府畏惧欧美帝国主义，且受府内决议不和、财政困窘、换地拖延等各方面错综复杂因素影响，收回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而解放战争的到来让这股收回热潮戛然而止。国民党政府时期并未收回跑马厅的管辖权，但跑马厅何去何从却一直备受瞩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上海，重新面对跑马厅收回的问题。跑马厅长久以来的经营策略与手法是面向外侨和上层人士，“维持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菁英式气氛”^⑤。这种经营理念与新中国宣传的“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人民主体性”社会政治氛围完全背道而驰。并且，近代以来社会舆论基本把跑马厅认定为殖民者非法掠取的产物^⑥，对跑马厅的历史建构，深刻地描绘

① Henri Lefebvr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trans. by Michael J. Enders. *Antipode*, vol. 8, no. 2, 1976, p. 31.

② 《提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1946年9月5日，档号 Q001-09-0021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市民投票反对赛马》，《申报》1946年9月14日，12版 《恢复赛马问题议员大多反对》，《申报》1946年9月12日，4版。

④ 《收回跑马厅》，《文汇报》1946年11月9日，3版 《项秘书长建议跑马厅收回方式》，《申报》1947年1月7日，6版；张宁：《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2期，第111页。

⑤ 张宁：《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2期，第105页。

⑥ 张宁：《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2期，第116-119页。

和刻画出了关于“洋人一匹马，农民两行泪”的情节及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殖民侵略象征符号。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高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剔除殖民印迹是重构跑马厅的第一要义。

1950年3月，上海市地产局为了配合政府收回跑马厅提交了一份关于跑马厅场地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回顾了跑马厅的历史，认定其是帝国主义强取豪夺的产物^①。随即上海市公共房产委员会综合了解放前的资料掌故和解放后的相关补充资料，油印刊行了一份《跑马厅产权问题研究报告》。这份关于跑马厅产权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详细披露了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跑马总会等外国洋行大班们，非法强占农民土地，利用跑马厅赛马赌博不断剥削中国人民的情况^②。当时上海的报纸也配合政府同步发表了相关的报道^③，批判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配合抗美援朝战争）。这为誓必收回跑马厅营造出强大的社会舆论。

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改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依附姿态。在跑马厅收回问题上，人民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完全封锁跑马厅的财源，除公家无偿借用以外，不允许跑马厅开展任何营业性质的活动^④。不仅如此，人民政府还采纳了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顾准与地政局局长汪维恒联合提出对跑马厅在内的外国建筑按新拟定的标准征收地价（产）税的建议^⑤。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进而提出对跑马厅采取“继续拖下去，既不明白免除其地产税，亦不加紧催缴”的处理方法得到了政务院审批同意。跑马厅在缴纳各项税收的同时，还得维持日常开销用度，且不能辞退原有职员^⑥。坐吃山空的局面导致跑马厅负债累累，高额的地产税也迟迟未能付清^⑦。这些针对性的处理办法让跑马厅经营步履维艰。跑马总会从希望出让，转而提出交换郊外之地，继而提议租与政府抵押地税，随后愿意捐献^⑧。直至跑马总会的主要负责人不得已一一离开中国，跑马厅的资产和所有权已无任何其他异议可能。1951年

① 《上海市地政局关于跑马厅场地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转引自范根娣选编《1951年收回跑马厅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第21页。

② 《跑马厅产权问题研究报告（外人在沪强占中国人民土地典型例子之一）》，1950年7月29日，档号B1-1-50，上海市档案馆藏；张宁：《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1946-19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2期，第118页。

③ 《九十年代的跑马厅》，《文汇报》1951年8月28日，1版；《跑马厅最典型的侵略故事（上）》，《新民晚报》1951年1月22日，3版。

④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致上海跑马厅》，1950年3月20日，档号B257-01-00033，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指示》，1950年3月6日，档号B257-1-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朱纪华主编《档案里的金融春秋》，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罗银胜《顾准的后半生》，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⑥ 张宁：《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1946-19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2期，第121页。

⑦ 范根娣选编《1951年收回跑马厅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第23页。

⑧ 老迂《上海跑马厅收场的回忆》，《体育文史》1983年第4期，第52页；范根娣选编《1951年收回跑马厅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第23页。

8月4日外交部才同意正式收回跑马厅，将所有土地列为公有之地，8月27日，上海军管会最终下达了收回跑马厅的正式命令^①。至此，跑马厅终于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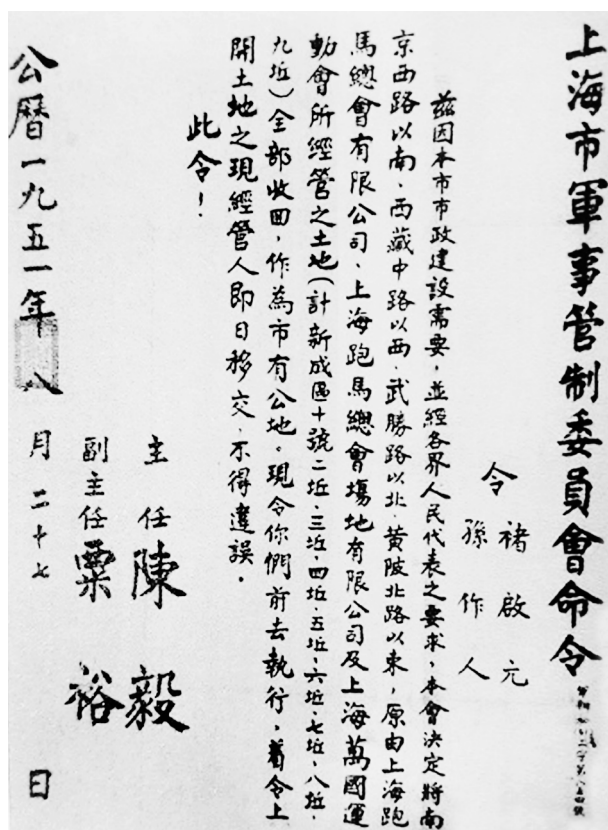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收回跑马厅的命令

(图片来源：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研究室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编《黄浦经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至于跑马厅收回后的用途，民国时期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以及社会名流都各抒己见。郑正铎就曾提议：“像跑马厅这样的地方，实是建立公园最好的地点。”^② 而将其改建成公园、戏院、文化城、住宅区、运动场等各种建议不一而足，但由于收回运动搁浅迟迟未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跑马厅历经数十年风雨，撇开其娱乐休闲场所的身份，一直具有着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从早期以英美为首的武装力量的操练、检阅，到租界内各国庆典仪式的举行，如美国国立纪念日，英皇登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摘由纸》，1951年8月4日，档号B001-01-00050，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收回跑马厅土地的命令》，1951年8月27日，档号B001-02-00728，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郑振铎《上海之公园问题》，《文学周报》1927年第4期，转引自倪墨炎选编《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基，再有类似庆祝协约国胜利等集会及游行在此举办^①。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跑马厅华籍职员悬挂中国国旗被跑马厅管理人员撕扯，经过抗争最终扬眉吐气地将中国国旗升在跑马厅上空一事，反响尤为巨大。跑马厅悬挂国旗作为国家恢复主权的象征得以被民众认知^②。1946年2月，蒋介石回到阔别9年的上海，在跑马厅参加了20余万人的欢迎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时，同样赋予了跑马厅的实现“独立自由”，“维护国家的主权”的政治象征意义^③。

跑马厅政治符号意涵在建国后得以延续。跑马厅还未收回时，人民政府已经获取了使用权力，开国庆典、庆祝“五一”“五四”“一二九”运动、舟山解放等集会游行接二连三在此举行。可见虽然执政党发生了变化，对跑马厅政治象征意涵的认同却延续下来。至于这块土地的功用，各界人士和单位也出谋献策，同样继承着民国时期的建言特点，众说纷纭^④。但大多数人民更倾向于把这一场地用作“人民广场”，有不少市民写信到《新民晚报》表达了“希望它能正式成为人民广场”的意愿，甚至有读者直接提议定名为“上海人民广场”^⑤。195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国庆、“五一”劳动节，上海均缺乏大规模庆祝场地为由，主张先以“市政建设”为名，将跑马厅改建成一座用来游行、示威的永久性集中场地^⑥。在人民政府开展收回工作时，陈毅就曾指出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它象征着新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头彻尾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⑦秉持这一精神，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以许涤新为主任委员，姚溱、赵祖康为副主任委员的专门委员会处理跑马厅管理与改建事宜^⑧。1951年9月6日，人民广场建设管理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决定根据各界人民要求及社会活动的需要，先在场地南部修筑‘上海人民广场’，以供将来游行示威及举行群众大会之用”^⑨。上海人民广场的名称和功用也就此尘埃落定。

名称作为空间符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接反应出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承载着

① 钟靖 《空间、权力与文明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4年，第50-58页。

② 《一件扯国旗的纠纷》，《泰山》1946年革新第1期，第2页。

③ 申报馆编 《申报上海市民手册》，申报馆，1946年，第5页，转引自谢泳 《杂书过眼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62-63页。

④ 《上海人民政府教育局关于提出在人民广场内辟建人民体育场的函》，1951年9月5日，档号B1-2-752-4，上海市档案馆藏 《明天的跑马厅》，《新民晚报》1951年8月2日，2版；黎汶 《“人民广场”如何利用》1951年8月30日，2版。

⑤ 《跑马厅空着干什么》，《新民晚报》1950年1月2日，6版；筱斋 《提供跑马厅正名意见》，《新民晚报》1951年5月23日，2版；秀娟 《明天的跑马厅》，《新民晚报》1951年8月2日，2版；黎汶 《“人民广场”如何利用》1951年8月30日，2版；周志萍 《赞成定名为“上海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51年5月27日，2版。

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致市委各常委同志》，1951年5月3日，档号B1-1-5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陈毅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⑧ 郭红解 《人民广场忆往》，《新民晚报》2014年10月3日，A13版。

⑨ 《上海市人民政府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51年9月6日，档号B1-1-1090-1，上海市档案馆藏 《跑马厅内修筑人民广场 今天上午举行开工典礼》，《文汇报》1951年9月7日，3版。

城市人民的文化记忆。“人民广场”在消解残存殖民印迹影响的同时，彰显着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契合人民的政治认同。上海人民广场名称的落实及功用的确立，为其物质空间生产注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上海人民广场的空间再造

人民政府接管上海之后，考虑到上海独特半殖民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建设与众多风格的建筑荟萃，参照苏联的城市管理规划特点，提出：“用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方法，在保留原有城市基础上，加以彻底整顿、重新规则，遵循实用、经济与美观的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城市的性质和特征。”^①由此，人民政府更侧重于在基本维持旧有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基础上，对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空间场所进行改造。这种再造缘于树立人民政府威权和彰显新政治诉求的需要，人民广场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基于人民广场的功用需要，时任上海园场管理处处长、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员程世抚对人民广场的规划和设计，采取与人民公园堆假山、挖河道、建水榭游廊、植树丛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在维持广场原有结构基础上，重点拆除广场内部的原有设施^②。

1951年9月7日上午，上海市举行了人民广场开工典礼。除了参加改建工程的工人与青年团员一千两百人出席以外，上海市各机关首长、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均派了代表参加^③。这次改建主体工程是修筑用于游行队伍通过的人民大道。这条大道横贯广场，打破了过去九十年跑马厅的完整格局，从西藏中路福州路口直达黄陂北路大门^④，“长四百七十公尺，宽一百公尺”，据称有三条延安东路并在一起那么宽^⑤。为了便于游行，工程对场内松软的地面进行加固，铺上了石块、煤屑、黄泥和柏油。原来环绕跑马厅的沟壑被填平，部分篱笆也被拆除，方便游行队伍进出广场。七八百位建筑工人、搬运工人和踊跃报名的来自上海各区机关、学校、商店等单位参加义务劳动的两千多位青年团员加入了修建工作，少先队员和上海剧团工作人员也络绎而至，唱歌跳舞，慰问劳作^⑥。团市工委的领导在每一批义务劳动队劳动之前都会举行一个简单仪式，鼓舞大家，“在这块人民自己的土地上，将永远飘扬着我们美丽的五星红旗”，“为祖国服务是最大的光荣”^⑦。从开工典礼庄严正式的场面和例行的义务劳动仪式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对改建人民广场的重视，这是重组上海城

① 《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 许步曾《寻访犹太人 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园林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③ 《改建“跑马厅”为上海人民广场 今日上午举行开工典礼》，《新民晚报》1951年9月7日，1版。

④ 《人民广场路面工程竣工》，《文汇报》1951年9月30日，4版。

⑤ 《人民广场路面修建完成》，《新民晚报》1951年9月30日，4版。

⑥ 《二千一百名青年团员今晨冒雨参加义务劳动》，《新民晚报》1951年9月9日，4版。

⑦ 《我参加修建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51年9月22日，2版 《二千团员假日义务劳动 抗风冒雨修建人民广场》，《文汇报》1951年9月10日，3版。

市中心空间的一项政治工程。正如潘汉年在开工典礼上所言：“标志着上海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伟大力量。”^① 这个修建过程中，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踊跃参与这项“人民自己的工程”^②。人民广场的改建是一个反复修筑的过程，直至1960年代中期市人委办公大楼竣工，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广场才算真正完成。人民广场的数次修建与人民群众的参与紧密相连。人民政府在广场建造的过程中，一直着力宣传建设中的劳动人民。在人民群众干脆利落地铲除殖民势力遗留印迹，大刀阔斧地开辟属于自己壮丽广场的同时，广场的“人民”性彰显无疑。铸造空间的过程是一个策略性的政治过程^③。这是对广场“人民”意识形态的渲染，是对跑马厅殖民性郑重其事的解构，是民族主义空间对殖民主义空间根本性的颠覆。在上海人民心中形成了关于广场政治意义的定势思维，完全契合人民广场空间生产的政治构想。



图2 人民广场开工典礼



图3 人民义务劳动参加人民广场建设

(图2 图片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一座城市的60年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页；图3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1951年9月10日，2版)

1954年，人民广场再次大修。人民大道进一步扩建，长度延伸至近600米，大道中部原来的煤屑路面铺砌成宽为23米、长516米长的花岗石，并在其两旁各铺筑一条宽达13米半的柏油路^④。改修后的人民广场呈半圆形，东自西藏中路，西到黄陂北路，南界为武胜路，北接人民大道，南北深310米，东西长550米，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可容纳近十万人参与集会活动^⑤。1955年，在广场中央又修筑了一条

① 《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工典礼上潘汉年副市长的讲话》，《解放日报》1951年9月8日，1版。

② 惜珍《永不飘散的风情 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③ Henri Lefebvr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trans. by Michael J. Enders. *Antipode*, vol. 8, no. 2, 1976, p. 31.

④ 黄跃金编《上海人民广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6页；《上海人民广场大道开始修建》，《文汇报》1954年6月25日，2版；《人民广场大道建造工程接近完工》，《新民晚报》1954年8月26日，1版。

⑤ 黄跃金编《上海人民广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9页；上海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黄浦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76页。

宽达128米，长160米的柏油路面，垂直通往人民大道，南北走向的两条道路交叉构成丁字型道路，两旁空余的扇形空地上铺建了两个草坪，草坪在1959年国庆前夕被改建为水泥混凝土地坪^①。



图4 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广场

(图片来源:姚丽璇编著:《美好城市的百年变迁 明信片上看上海》上册,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4页)

依据媒介环境学派泛媒介论的观点,环境被纳入媒介的范畴。这里的环境概念囊括了空间。可以说,空间作为媒介而存在。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曾说,时间偏向的媒介具有可以长久保存的特点,并容易体现出传播上的威权性^②。物质空间实体作为信息载体是倚靠时间的媒介。即使伫立不动,空间也如“无声的语言”一般,藉由它的建筑特点传达深刻意涵。“一种媒介的符号形式产生它编码的特征,而媒介则用这样的编码来表达信息。”^③人民广场空间的政治符号形成于它的空间编码。从图5可看出,广场整体是对称布局,严整朴素,“对称的空间原则一般都是展示权力的首选方式。”^④南北走向中轴线对称的空间造型,让广场更显庄严,并且轴线的朝向表征了权力的来源,即轴线北端的市人委办公大楼(未建此楼时,临时观礼台也搭建于此),烘托了人民广场的政治氛围,隐喻了人民广场的主流意识形态。

广场中的空间符号既表征也建构起了广场明确的政治主题意向。人民大道两旁

① 《人民广场大道南部广场全部工程“五一”节前完工》,《新民晚报》1955年4月27日,1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人民广场南部草坪改建水泥地坪的批复》,1959年8月15日,档号A54-2-640-2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③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④ 蔡永洁:《城市广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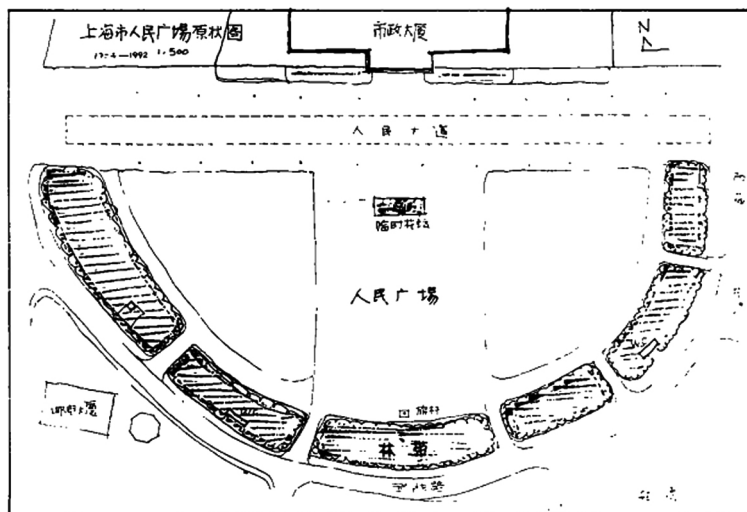


图5 上海人民广场原状图（1954 - 1992 年）

（图片来源：周在春 《上海人民广场改建设计》，《规划师》1998 年第 1 期，第 47 页）

树立 24 座四丈高的华表式云彩花纹灯柱，铁如意灯头上悬挂着 96 盏宫灯。华表是我国古代宫殿、陵墓前巨大标识性石柱，象征权力的图腾标志；如意亦是古代文化中具有吉祥寓意的圣品，拥有权杖的寓意。而面积宏大、对称严整、路面宽阔、硬质地面、少绿化、无休息设施、有观礼台等特定状态，都是权力建筑之独有风格，给人带来庄重、浩大、长久、稳定与刚性的感受，这体现了国家权力利用空间媒介进行编码的特点，也是政治权力建筑偏好的表达方式，即“非壮丽无以重威”^①。广场空间在此演化成为“象征性符号媒介”^②。人民政府借助上述特有的空间媒介语言明确地表达政治威权的逻辑，传递出新政权执政正统与合法的信息，呈现出顺应民心与国泰民安的政治寓意。“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在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③ 人民广场宏大的空间体量轻而易举就能把在场的人压缩得非常渺小，让人产生远离感和无助感，从而力图凝聚成集体以壮大声势抵抗脆弱与孤立^④。王安忆小学时曾参加了一次旧貌换新颜建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回忆当年参观完人民广场等建筑的感受时，她写道：这是巨型建构，供重大事件上演，并不是供人的生活，对于生活，它们的比例太夸张了，这些建筑显露出“纪念碑式的宏

① 韩兆琦主编 《史记文白评精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6 页。

② (美)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台北：远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 322 - 325 页。

③ (加拿大)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28 页。

④ 蔡永浩 《城市广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7 页。王安忆 《黑弄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 126 - 127 页。

伟性质，这是正史的气质，人在跟前变得渺小而且盲目，就像蚁群一样的生物”^①。作为媒介的广场空间“是对个体性的否定和取消，是和强调集体主义至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匹配的”^②。广场物质空间塑造并控制着人民的行动，凸显了广场的政治功能。



图6 1955年新建成的人民广场

(图片来源 《新民晚报》1955年4月21日, 1版)

“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③透过其体量、地面、装饰等空间符号的编码，人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得以清晰表征。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曾谈及：“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而产生的思想、情感、时间、空间、政治、社会、抽象和内容上的偏向就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就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偏向。”^④不论日晒雨淋，人民广场都伫立于上海市中心，保持绝对的曝光度。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固于其中，通过广场媒介空间语言无声地传递着权力的意志，确认和展现其政治符号的工具性，让人民群众接受与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意涵。

二、人民广场的政治仪式

空间并非简单的物质存在，是复合、多维的。“空间的生成不仅指物理空间的生成也包括社会空间的生产即社会关系的创造。”^⑤任何物理空间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

① 王安忆 《黑弄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26-127页。倪伟 《空间的生产与权力敞视》，王晓明主编 《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

② 倪伟 《空间的生产与权力敞视》，王晓明主编 《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

③ (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④ Lum, C. M. K.,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8, no. 1, 2000, p. 2.

⑤ 庄友刚 《何谓空间生产》，《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40页。

网格之中，就不可避免地升格为社会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并非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① 上海人民广场物质空间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偏向，传递了人民政府特定的政治需求，并由此生成了广场各种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可见，人民广场物质空间的特点影响着社会空间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在广场中建构和发展了符合权力构想与认同的社会关系，即“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②。正如詹姆斯·W. 凯瑞（James W. Carey）所提出的仪式性传播模式一样^③，仪式性的政治传播活动是这一时期广场的主导。人民广场开展的以稳固人民政权，宣传政府执政合法性，传达政令纲领为主旨的政治仪式，持续性地表征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党领导的共同信念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以此“制造同意”^④和维系社会紧密团结。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政治仪式以其强大的集体重复性建构人们的政治共识，成为社会联结的独特纽带，进一步丰富并巩固了人民广场政治符号的深刻内涵。

（一）集会游行：政治化欢庆

集会游行是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广场最耀眼的集体活动，主要形式有：为欢庆节日或重大事件（如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国外元首来访等）而举行的庆典集会；反侵略、反帝国主义的示威集会游行；批判性的集会，如各种公审公判大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选取国庆集会展开研究。较之其他集会，国庆集会次数多，备时长，规模大，涵盖广，且程序仪式最为完备，最能反映建国后政治欢庆的时代特色。

装扮布置属于国庆庆典的一部分。以建国五周年的庆典为例，人民广场“气象万千，高大的、宫殿式的检阅台雄伟瑰丽”，“矗立在中心，六层楼高。碧绿色的顶，两根朱红色的圆柱，奶白色的栏杆，整个主席台布置得像是一座宫殿。台中央，悬挂着巨幅毛主席画像。台两侧，十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台前，竖立一块块白色的标语牌，每个标语牌上写着一个红色大字。连起来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 p. 73.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② Edgar, A. & P. Sedgwick, eds.,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340. 转引自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71页。

③ Carey, W. J.,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in McQuail, D., eds., *Mc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39.

④ [英] 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扉页。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①

国庆庆典遵循一套基本程式。庆典当天，参会的游行队伍需率先到广场集合，其余的游行人员则在广场附近街道齐集待命，观礼人员入席后，上海党政军领导和各界著名人士登台，全体立正致敬；随后，发射礼炮二十八响；继而，国歌声奏起，上海市委书记或市长发表讲话；接着，由大会总指挥发布游行命令，盛大游行随即在军乐声中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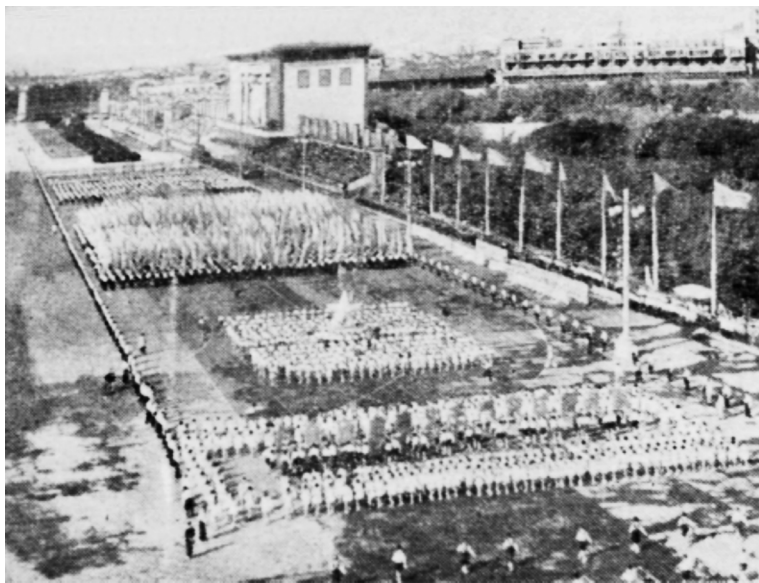


图7 游行队伍依次通过人民广场

(图片来源 《新民晚报》1959年10月1日,4版)

具体到集会主要环节。首先是上海党政最高领导发表讲话。领导讲话一般先回顾解放以来上海的发展，肯定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绩；分析国内外的形势；盛赞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最后，展望上海的未来。如国旗、国徽一样，此时的领导已经化作象征国家权力的符号。领导的讲话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秩序中的权威。“证明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证明了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无穷无尽的。”^②“正义”“正确”体现出国家权力是代表着所有“人民”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与共同信仰，明确表达着政府执政无可置疑的正确，肯定党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正当与合法。领导发言完毕后全场“掀起了长久的热烈的欢呼”也充分体现出高度凝聚共同体的认

^① 《上海昨举行盛大庆祝典礼 全市有一百万人参加游行》，《文汇报》1954年10月2日，4版。杨天亮 《一个甲子前的沪上国庆》，《解密》2014年第10期，第10页。

^② 《今晨举行盛大国庆节庆祝典礼》，《新民晚报》1954年10月1日，1版。

同态度^①。

庆典集会中游行队伍涵盖了被认为隶属于国家建制下的所有“人民”。国庆庆典中数次融入了阅兵仪式^②。陆海空驻沪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在庆典中尤为引人注目。从政治象征层面而言，武器装备不但是“支配性的象征符号”，还是“工具性的象征符号”^③。武器装备的“支配性”主要体现在其技术的先进程度，可以展示国家实力的强盛，军工水平的高度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大。如1950年庆典上的坦克战车（如图8），以及冲锋枪、轻重机枪、六零炮、扫雷器、现代通讯器材及各种防化学武器装备^④。作为“工具性”符号，武器装备主要在于明确表达鲜明的敌我关系，在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口号时，鼓舞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敌。同时，士兵们强壮刚毅、挺拔有力的身体，整齐划一、简洁规范的动作也化身为兼具“支配性”与“工具性”的政治象征符号。不仅体现出士兵控制与规范身体的强大能力，而且展示出他们誓死保卫国家的忠诚。阅兵仪式极大鼓舞和提振了人民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勇气和信心，提升了人民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感。



图8 庆典中的阅兵仪式

（图片来源 《解放日报》1950年10月2日，1版）

其他游行队伍在庆典中也都各显神通大展各自“礼器”——标语、实物、模型、成绩图表及保证牌等的风采。在十周年庆典中，宝铝汽车材料厂等工厂的工人们展示着连夜装配起的“一辆天蓝色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拖拉机”，青年无线电机厂的献礼品是“四用电唱、收音、录音，电视机”^⑤。农民队伍“出现了一座座水稻、棉

① 《上海百万人民昨举行节日游行》，《解放日报》1954年10月2日，2版。

② 1950年—1954年和1959年人民广场国庆庆典进行了阅兵。

③ [英] 维克多·特纳 《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页。

④ 《上海二十万人集会游行庆佳节》，《文汇报》1963年10月2日，1版 《七十万军民游行示威》，《解放日报》1950年10月2日，1版 《英雄队伍！英雄业绩》，《新民晚报》1959年10月1日，4版。

⑤ 《十年跃进普天同庆》，《新民晚报》1959年10月1日，3版。

花、包谷堆成的“粮山”“棉山”和“硕大的蔬菜和肥壮的猪，鸡、鸭等活物和模型”^①。上海教育工作者抬着“锻炼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标语牌；青年学生“缓缓地行驶着一艘漂亮的远洋巨轮——大学生设计的全国最大运煤船，载重一万五千吨”参与游行；体育健将的丰硕果实是上海市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代表团的光荣成绩：创造世界新成绩五项，打破全国记录三十七项、获得七个团体冠军……^②象征各行各业成绩的“礼器”被置于广场国庆仪式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演变成了鲜明的政治象征符号，意指在新中国，在党领导下，人民生活与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

倘若说“礼器”展示注重理性表达，那么浩浩荡荡的腰鼓队表演，气球、和平鸽的放飞，体操与《智取威虎山》等各类剧目的演出则更注重感官刺激。震耳欲聋的腰鼓声烘托了喜庆氛围，激发人民火热的激情。1953年国庆中，妈妈们身穿新衣头戴花环，兴高采烈地推着年幼的孩子参加游行，孩子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见图9）。^③1965年国庆，数千少女参与团体操表演，“全场变成了鲜花组成的海洋，一闪，又变成了百花的行列，好像数十条花龙在地上徐徐滚动。忽而，一片红花变幻成为绿色的波浪，穿着红色短裙的少女也变为‘百花仙子’，翩翩而舞”，最后她们在广场主席台前“写下了最美丽的诗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④。欢乐喜庆最大限度激发了人民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共鸣与响应。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合法性是被表演的^⑤，合法性有时需要通过感性政治表演来获表征。腰鼓、鲜花、和平鸽等器物，以及人和表情都政治符号化了，不仅是为了“告知”，更是为了“感动”，传递出一派欢乐、和平、美好的图景，外化、张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国庆庆典上既固定又变化的政治口号及标语精要地传递国家不同时期关于国防、经济、政治建设的政策制度，体现出显见、即时而又一以贯之的政治教化风格。从表1可见，针对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庆典上逐年强调的政治诉求，即为维护国家稳定、凝聚百姓民心政治策略的直接反映，反应迅速，且宣传持续和强化巩固。1958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同年国庆庆典就出现了民兵队伍，之后历年庆典上民兵都是一道亮丽风景。可以说，庆典像一个清晰的刻录表一般准确地记载着国家政治的风云变幻。

在国庆庆典仪式上，从空间布置到仪式进程，包括讲话、表演、标语等皆传递出“民族—国家”的认同观及国家政治生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完美地塑造出一个

① 《英雄队伍！英雄业绩》《新民晚报》1959年10月1日，3版。

② 《上海人民欢庆全民伟大节日》，《文汇报》1959年10月2日，1版 《上海六十万人盛大游行》，《解放日报》1959年10月2日，3版。

③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解放日报》1953年10月3日，3版。

④ 《花团锦簇变化多样》，《新民晚报》1962年9月28日，4版。

⑤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6—237页。



图9 (左) 妈妈和孩子共同参与游行



图10 (右) 人民广场的团体操表演

(图9 图片来源 《解放日报》1953年10月3日, 3版; 图10 图片来源 《解放日报》1965年10月2日, 4版)

具有高度聚合力的人民共同体。人民广场作为承载丰富政治表达的空间形象也由此不断积淀凝刻于上海人民的集体记忆中，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在上海普及并日常生活化，无可厚非的成为政治集会空间的代名词。

表1 国庆庆典游行的标语、口号及其对应的社会政治背景

	1950 - 1954 年	1950 - 1964 年	1952 - 1964 年	1953 - 1957 年	1958 - 1964 年	1959 - 1961 年
标语 口号	巩固胜利! 保卫和平! 和平万岁!	解放台湾! 反对美帝国主义!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练好身体, 建设祖国, 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	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人民公社万岁! 大跃进万岁!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 加强农业战线, 战胜自然灾害, 力争农业增产
社会背景、 政治环境	建国后政局不稳固	美国支持、护卫台湾	体育事业要为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	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 全民皆兵	三年自然灾害

(二) 展览活动: 集体性政治观看

因得天独厚的中心位置，人民广场成为当时举办展览的主要场所^①。这期间，人民广场的展览主要涉及农业、工业、历史、科技、卫生、艺术等内容。工农兵等群体在各自生产、工作、建设等方面取得成绩的展览成为当时的主流。例如广场科学普及

^① 此处涉及的展览主要是广场本身的展览，还包括人民广场前身跑马厅建国后举办的展览，人民广场合围道路和建筑内的展览，如西藏中路、黄陂北路、人民大道上的展览以及工人文化宫、中苏友谊馆、上海博物馆（1959年后迁往河南路）、体育宫等等。

画廊展示工农业生产的新成果和新技术^①，以及1953年华东农展中反映华东广大农民的集体劳动创作成果^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农业、文艺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果也是重要展示内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四周年图片展览和民主德国实用艺术展览就吸引了不少参观者^③。另一展览重点是历史回顾及对相关时事的展示，革命烈士手迹展、朝鲜前线实物图片展是其中代表^④。也有一些展览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上海市轻工业产品规格品质改进展览会则力求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响应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⑤。总体而言，广场展览和各种政治诉求紧密结合，即便是花卉展上，花卉也被摆出了“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造型，被扎成了“和平万岁”的花山^⑥。



图11 1950年农业展览

(图片来源:张永林、周令飞主编《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集·1946-195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 ① 《科学普及画廊增添新内容》，《解放日报》1962年5月6日，2版。
- ② 《华东农民的光辉成就》，《新民晚报》1953年2月1日，1版。
- ③ 《“图片展览”隆重开幕》，《解放日报》1965年1月12日，2版 《民主德国实用艺术展览会开幕》，《新民晚报》1954年2月8日，2版。
- ④ 《朝鲜前线实物图片展览今起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文汇报》1952年2月15日，2版 《正气磅礴》，《解放日报》1962年10月14日，2版 《毛主席语录画展正式展出》，《文汇报》1967年6月3日，3版。
- ⑤ 《首届妇幼卫生展览中旬在跑马厅揭幕》，《文汇报》1950年6月7日，3版 《“防台防汛图片展览会今起在本市巡回展出”，《文汇报》1953年7月20日，2版 《上海工商社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468-469页。
- ⑥ 《六万盆菊花》，《新民晚报》1955年11月5日，2版。

这一时期展览主要以集体参观为主，有的甚至只接待团体观众^①。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为参加展览的主要力量。人民广场展览可谓是集体性的政治观看。政府部门通过对展览主题“议程”的掌握（政治议程设置）以及对展品信息的引导，将政府的决策、议题及意识形态都潜藏于展品之中，以此加强民众的政治认知^②。1951年举办的新国画秋季展中，《雪里行军》和《中朝会师》等关于抗美援朝的作品是展示的重点，要体现志愿军的英勇及与朝鲜军队的伟大友谊^③。民众观看展览，是一个仪式性的革命文化洗礼过程，是一个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化的过程，帮助人民了解政策制度，鼓舞人民坚定革命工作信念，满足人民对于建设共产主义图景的美好想象。无论是展品还是民众，在被看与看之间都呈现出相对单一的政治色彩。爱国卫生展览中第一部分内容“以图片、照相、文字来说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阴谋”^④，“看看受细菌战残害的沈阳机器工人严宗尧从受害至死亡的过程，我们心底燃起了愤怒的火焰，对于那些披着人皮的野兽的嗜血行为，感到无法容忍”，《文汇报》一位编辑的观后感充分回应着展览的政治议题^⑤。套用本雅明的表述，广场展览可谓是“艺术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美学化”^⑥。并且，这类展览产生的影响随着榆林区长阳路仁庆坊居民委员会的“笔记本”和北京西路第五小学六年级少先队员彭小庆的“抄录”而延伸。未能参与广场展览的参观者会在紧接着各单位组织的“讨论会”和“宣传会”中完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教育^⑦。承办展览的人民广场，像一个辐射全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把人民政府的政治理念传承扩散开去。

（三）文艺演出：泛政治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要除旧布新。为了更好管理建设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宣传动员传统，加强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输与教化，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因此，宣传动员成为一种重要且必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在党主导文化的体制下，上海文艺界积极响应，成为宣传的中坚力量。这与党早期提倡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举凡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⑧完全一致。人民广场成为文艺宣传的大本营。

在人民广场进行文艺宣传的队伍包括了各文艺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单位，上海市

① 《防台防汛图片展览会今起在本市巡回展出》，《文汇报》1953年7月20日，2版。

②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孟颖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③ 《新国画秋季年展》，《新民晚报》1951年10月5日，4版。

④ 《爱国卫生展览会明日开幕》，《新民晚报》1952年8月23日，4版。

⑤ 《加强认识》，《文汇报》1952年8月24日，1版。

⑥ Benjamin, Walter. ,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242.

⑦ 《组织人们人民广场参观卫生展》，《新民晚报》1952年9月2日，4版 《光荣廊前》，《解放日报》1956年5月3日，1版。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

电影局，沪剧、越剧、评弹、话剧等各个不同剧院、剧团的文艺工作者，及新世界、大世界、先施等游乐场的艺术队伍，甚至还有中央京剧院、浙江昆苏剧团等外地文艺团体^①。他们不再拘泥于剧院里的专业艺术表演，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文艺演出。人民政府不但乐见而且鼓励通过文艺表演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以影响和教育人民，因此文艺宣传演出在当时盛行一时。由此也促成了不少工厂、学校等单位的群众文艺队伍的出现。1958年，“上海农业药械厂的工人，组成了二个文艺队”，上海电缆厂、上海交通大学、社科院、67中学组建的文艺队都踊跃创作诗歌，排演活报剧及快板等节目^②。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国情，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先进人物与事迹，都是这一时期文艺演出的基本主题^③。根据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广场上文艺演出的内容也随之改变，依次出现关于总路线、中东战争、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八中全会、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声援黎巴嫩、古巴等国家的宣传场面。其中也不乏卫生宣传这样的配合政府具体工作需要的演出。

人民广场面积大，一般文艺表演队会在人民大道上搭好表演台，挂好幕布，装上扩音器。若要配合大规模的宣传，表演台就不止一个，在“反对美帝侵略、坚决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宣传周”中，人民广场的表演台多达五个，分散在广场的不同区域^④。此外，随处还分散着不少宣传队，向人们发送作家们创作的“诗传单”。广场还曾出现作协出版的人民广场大字报“红旗飘”，上面刊登群众自发创作的诗歌、小说等作品^⑤。

文艺宣传队结合自己的文艺特长将宣传任务与表演结合在一起，在人民广场进行着各种戏曲、活报剧、音乐、舞蹈、演唱、朗诵、快板、相声等形式的文艺宣传。有些表演自然、亲切，与现在流行的说唱一样，把宣传主题夹杂新鲜事，用不同唱腔演唱出来，很有一些随性创作的意味，颇受在场观众欢迎。在宣传总路线时，评弹界轻骑队的表演，就像老朋友偶遇闲聊谈出了兴致，因此提出“阿要唱脱两声”，于是弹起琵琶、弦子，唱道：“今朝一勿唱啥‘珍珠塔’，也勿唱啥‘玉蜻蜓’，唱格总路线格好事情……”“国产飞机到上海”“扫盲工作大进罩”^⑥。

著名表演艺术家，像周信芳、丁是娥、上官云珠等都是人民广场的演出成员。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多次登台表演，在一次反美宣传中，她唱起了自己创作的反美越剧开篇《怒涛》：“黄浦江上泛怒涛，反帝的吼声似海啸。六月十七，台湾被美帝侵占十年了。

① 《百花怒放艺人总动员 欢天喜地齐唱总路线》，《新民晚报》1958年6月4日，4版 《三个著名外地剧团在上海演出精彩剧目》，《文汇报》1958年7月3日，2版 《条条马路发出吼声》，《新民晚报》1958年9月8日，3版 《沸腾的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60年6月26日，1版。

② 《上海开展群众性反侵略文艺运动》，《文汇报》1958年9月9日，5版。

③ 李德平、郭强主编 《实用宣传学》，香港：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第93-100页。

④ 《高举艺术武器打击美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6月28日，8版。

⑤ 《街头艺展生动及时》，《新民晚报》1958年6月6日，2版。

⑥ 《百花怒放艺人总动员 欢天喜地齐唱总路线》，《新民晚报》1958年6月4日，4版。

十年来祖国人民一条心，无穷智慧和创造。日新月异大跃进，迅速出现新面貌。唯有台湾还被强盗占，犹如孩儿离了娘怀抱……”在场熟悉越剧唱腔的观众随声合唱^①。

“往来如梭的车辆和行人”是人民广场的常态^②，文艺汇演常常“一角锣鼓正响，引来了如潮的人群”^③。这其中还有许多附近的居民，“他们拿了长凳、带着矮凳，扶老携幼，欢天喜地地来听总路线，来听我们的新社会中的新故事”^④。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广场观众的情绪，配合他们的演出，使广场“沸腾”起来，让更多民众“循声前往”^⑤。文艺宣传者与观众打成一片的场面经常出现。上海合唱团的演员们唱着“八中全会发公报”“总路线进行曲”“掀起跃进高潮”等宣传性歌曲，唱完之后乘热打铁，把歌曲传单散发给在场的观众，当场教学“八中全会发公报”这首歌，最后台上、台下大合唱，场面声势浩大，大家都唱得群情激昂^⑥。因为活报剧宣传效果甚佳，文艺工作者结合时事编排了不少活报剧。当演员表演巴拿马人民奋起与美帝国主义抗争时，演美国人的演员肢体夸张狼狈逃窜，最终被套上绞索时，在场的观众欢声雷动，应和着一起高喊：“滚出去！美国佬！”^⑦台上说美帝国主义“懒”“臭”“揍”等字眼时，台下就哄笑一片^⑧，台上高呼口号，台下就回响震天。



图 12 勤艺沪剧团在人民广场演出活报剧“轰走美国狼”

（图片来源 《高举艺术武器打击美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6月28日，8版）

- ① 袁雪芬 《怒涛》，《上海戏剧》1960年第7期，第5页 《沸腾的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60年6月26日，1版。
- ② 孙式正 《人民广场周围景色新》，《新民晚报》1959年9月12日，5版。
- ③ 《街头演活报 吼声震四方》，《新民晚报》1954年1月16日，3版。
- ④ 《百花怒放艺人总动员 欢天喜地齐唱总路线》《新民晚报》1958年6月4日，4版。
- ⑤ 《沸腾的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60年6月26日，1版。
- ⑥ 《欢乐的歌声飞上街》，《文汇报》1959年8月29日，4版。
- ⑦ 《上街演出反美斗争活报剧》，《新民晚报》1964年1月15日，2版。
- ⑧ 《沸腾的人民广场》，《新民晚报》1960年6月26日，1版。

文艺工作者以这种看似娱乐的方式将全国主导的革命政治文化渗透进人民的思想观念与日常生活、工作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宣传方式与当时政治管理体制的特点息息相关，党“直接掌控社会，党的目标诉求与价值标准就会强制性地转化为全社会各类组织、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的目标诉求和价值标准”^①。生动有趣的表演方式，良好的交流与互动，人民广场的文艺演出将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党的政策法令有效地传递出去，长期、潜移默化地对人民进行“培养”，形成了对党的领导和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坚定“共识”。

（四）体育运动：革命化锻炼

解放后，体育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政府工作计划。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更是成为当时开展体育运动的宗旨^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不论是群众体育还是竞技体育的开展都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③“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项政治任务”^④。这一时期，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即市体委），各区县体委，以及各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基层体育协会成立，组建成上海市不同层级的体育管理网络，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运动^⑤。人民广场正是体育管理的重要空间，其间主要体育活动的开展充分配合着革命政治的需要。如同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言，这样的体育集体活动是政治机器，属于传播工具，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安全而发动人民锻炼的政治理念^⑥。

早晨五点钟，……绿化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有了来自各方的人群——工人、学生、机关工作者和一般市民……

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心大道上，每天五时以后就有成百的男女在做广播操；在另一块地段，有些工人们在做劳卫制操；靠龙门路入口处，是那些妇女和一些中老年男子在练身体舒展筋骨；沿着绿化的侧道，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练太极拳的人，他们总是沉静地、慢条斯理地动作着。在福州路入口地段，则可以看到一些年青人龙腾虎跃地在打着少林拳。逢到星期日和节假日，这里往往围起一道人墙，原来大家都在看他们使刀弄枪，对打对耍呢！^⑦

① 师晓霞《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②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③ 朱德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3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

⑤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⑥ Régis Debray,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91, p. 172. 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⑦ 《人民广场的早晨》，《新民晚报》1956年5月17日，8版。

这则报道描绘了广场晨练的热闹场景。虽然仅是人民广场体育活动的片段，却能体现当时广场体育文化的特点。“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①在体育口号的激励下，在集体组织的领导下，在体育骨干的带动下，群众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到人民广场，进行各种形式的锻炼。邑庙区烟纸业职工开展冬季锻炼后，“一百多人每天来到人民广场展开跳绳、广播体操，拍小皮球等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②。为了不断督促上海市民加强体育锻炼，砥砺群众的革命意志，市体委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并推行职工和学生的冬季锻炼标准^③。“不怕冷、不怕苦，坚持为革命而锻炼身体”，即使在三九寒天，人民广场都呈现一幅火热的锻炼图景，东一簇、西一簇的锻炼人群，为了达到劳卫制的及格标准，并迈向更高级别，锻炼得热火朝天^④。

大跃进开始后，全市掀起了体育运动大跃进的新高潮，上海经常性锻炼的人数约达三百万左右^⑤，人民广场的体育运动景象更是蓬蓬勃勃。在清晨或上午，当广播体操乐曲响起时，广场上常汇聚成百上千人一同舒臂展腰做被誉为“法定体育”的广播体操^⑥。常见的场面还有学生、工人或其他群众以集体为单位在广场上跑步。1960年的体育联欢周中，每天清晨来人民广场练习长跑的黄浦区学生教师人数可达两万之多^⑦。从1958年开始，简化太极拳成为了人民广场上又一个极富时代特色的运动。在国家体委改编和地方体委的推广下，太极拳学习班迅速壮大，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一万多学员参与学习。学员来自工厂、机关、商店、学校等单位，平均每班千人左右，以中老年职工为主，其中部分学员每天在人民广场学习拳法^⑧。学习结束，所有学员同在人民广场参加结业式，千人齐练太极拳，场面蔚为壮观^⑨。

人民广场还是比赛竞技的主场地。若逢体育周、马路运动会及基层群众体育竞

① 魏威 《从历史的角度透视我国体育功能的嬗变》，《体育文史》1990年第6期，第5页。

② 《冬天的清晨》，《新民晚报》，1959年12月18日，3版。

③ 1951年，教育局将体育工作列入学校的工作计划，与上海市体育筹备会一起在学生中推行了《上海市学生冬季锻炼标准》；1956年1月10日，职工冬季锻炼项目标准公布；1956年，在全市推广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下称劳卫制），至1957年底，全市已有21.8万人达到劳卫制及格标准 《一支越来越大的队伍》，《新民晚报》1956年3月5日，3版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④ 《一马当先全部通过劳卫制》，《文汇报》1958年11月15日，2版 《冬天的早晨》，《新民晚报》1959年12月18日，3版 《三九严寒何所惧》，《新民晚报》1965年1月12日，2版 《今晨人民广场千人冒雨集体冬锻》，《新民晚报》1965年12月15日，2版。

⑤ 《体育运动必须政治挂帅》，《解放日报》1958年10月3日，1版 《祖国在持续跃进中》，《文汇报》1960年1月1日，5版。

⑥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6页 《昔日一曲升起万众舒臂展腰 如今乐音虽响奈何操人稀》，《文汇报》1989年7月19日，1版。

⑦ 《百万青年卷入体育联欢周》，《文汇报》1960年5月31日，2版。

⑧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黄浦区推广太极拳运动》，《新民晚报》1959年12月6日，3版。

⑨ 《齐练太极拳》，《新民晚报》1961年4月29日，4版。



图13 建秀女中一个班级的女生在人民广场晨练



图14 黄浦区体委举办的第十二期简化太极拳训练班在人民广场举行结业式

(图13 图片来源 《新民晚报》1956年3月23日,3版;图14 图片来源 《新民晚报》1961年4月29日,4版)

赛,人们在人民广场的运动热情会更加高昂^①。1960年的大年初一,黄浦区的“工厂、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的老师、学生和里弄居民等一千四百人左右,”参加迎春长跑比赛^②。人民大道就是比赛跑步的主赛道,一般男女老幼都有相应的比赛项目,赛道两旁总围拢着加油助威的人们。在市、区举行的庆祝国庆或春节的接力跑中,人民广场常常成为比赛的起点或终点,成为各支参赛队伍汇聚的最重要场所,“运动员的火炬,织成了一片火海。配合广场上强烈的电炬,全场通明,象征着新中国的辉煌伟大,和全体人民强大的力量”^③。

结 语

政治符号是建构并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彰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建构一套政治符号、话语和概念体系尤为重要。人民政府运用了各种信息载体来承载政治信息。各种器物、图像、文字、口号、体态、时空符号作为确立和维系政治体系的载体在这一时期被广泛、系统地运用。

人民广场作为代表性的空间政治符号,在传递人民政府建设国家的政治理念和隐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秩序层面的过程中,因其空间的双重化特点而独具风格。虽然广场静默无语,然而在其物质空间的确立过程中,人民政府通过巨型体量、对称

① 自20世纪50年代上海就出现了形式多样、数次频繁的马路运动会。1958年3月31-4月6日,由上海市体委、市高教局、市教育局等9个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全民体育活动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的基层体育竞赛十分频繁,各种级别的体育比赛层出不穷。仅1958年,全市区县级比赛多达1347次。参见《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② 《迎春长跑》,《新民晚报》1960年1月29日,3版。

③ 《全市和平接力跑昨晚热烈举行》,《文汇报》1952年9月26日,2版 《春节红旗接力跑昨晨举行》,《解放日报》1965年1月24日,2版。

布局、轴线指向、硬质地面、华表、如意等空间符号的编码和重构将政治倾向嵌入其中，最终创造了符合人民政府空间诉求的广场。作为表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意涵的物质空间，人民广场富有“强烈的凝固的直观感”^①。这种直观感巩固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

在社会网格关系裹挟下，集会游行、展览活动、文艺演出和体育运动等充满明确政治诉求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行为在作为社会空间的人民广场一一开展。这期间，“人们在那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②。当时，“倘若有人说道阿拉阿爸、阿妈、阿姐等要到人民广场大游行啦，没有这份家幸的小朋友，就会无比羡慕地仰望着炫耀者，似乎他们本人要去游行一般”^③。在不同时期政治性仪式进程中，器物、图像、文字、口号、体态等政治符号也完全融入了人民广场的整体空间中。人民与广场空间交织一起，相互介入，不断延展着广场社会空间的边界，拓展着经典的政治符号形象。人民广场的政治寓意培育了广大人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社会空间网格下的人民广场充满了丰富的流动的渗透感。广场政治符号的双重特质更有利地塑造与强化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广场作为一个政治权力表征形象完全镌刻入人民的价值判断体系中，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化的过程。它最终符号化和概念化，契合时代和政治的需求，牢牢地把人民联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共同体之中。当然，政治符号形象并非人民广场的唯一形象，对此研究需另辟一文细述，故此不赘言。

本文系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A710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天津工业大学讲师，博士

①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② 张忱《文化广场札记》，《上海解放十周年》，第437页，转引自蔡翔、董丽敏等《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 吴莉莉《此情可待成追忆》，《新民晚报》2009年10月7日，B6版。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we re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fi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the *Analects* is a three-way communication process among Confucianism , construction path and construction concept. From top to bottom , political value and political system set an idealized political cognition framework , then through the politic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based on monarch and minister , which has functions of social connection ,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adjustment , the public's enlightenment by moral and emotional education is promoted. From bottom up , people who identify and internalize political information , extend interpersonal emotions into political emotions by emotional extrapolation , shape the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entire political system , and establish political trust. The deeper structure behind political trust construction in the *Analects* is communication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 which follows three principles and runs through them all. Firstly , it emphasiz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 which is instructed by the rational mind. Secondly , it uses moral education and emotional education to promot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irdly , it stresses the role of practical action over empty talk.

87 • Internet Mass Event , Internet Public Event or Something Else? Rethinking Internet Opinion Gathering

• *Dong Tiance , Liang Chenxi*

To conduct studies on internet opinion gathering , researchers usually utilized internet mass event and other concepts.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opinion gathering is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from internet mass event when analyz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behavior subject , behavior nature and law applic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more preferable definition should be internet public event. It can better expres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has deeper research traditions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fixing the drawbacks of crisis management , promote the study of public sphere pattern and promote internet empowerment and the public nature of media.

103 •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Square as a Political Symbol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People's Square

• *Zhong Jing*

People's Square in Shanghai ,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ymbolization of people's spa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has established certain political inten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pace reclamation , naming and material space production. Through ceremonies such as celebrations , exhibitions , entertainments , sports and other ritual activities , People's Square is further constructed as an important social space representing political demands for communication ,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an ethnic-state identity. The conformity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square's dual space has established and consolidated it as a political symbol that present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solidified visual sense and the sense of flowing penetration. As a political symbol of power , the square has been completely engraved into Chinese people's value judgment system.

英文编辑 段铁铮